



陕西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遣唐使在长安

韩养民 唐群◎著

隋唐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空前繁荣，中国成为东亚最强大的帝国，声威远扬，对亚洲各国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日本，朝野上下对隋唐文化更是仰慕、向往。日本政府曾先后向中国派出了十九次遣唐使团，巩固和发展了两国的友好睦邻关系。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以及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陕西新华出版
陕西人民教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遣唐使在长安

韩养民 唐群◎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 西安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遣唐使在长安/韩养民,唐群著. —西安:陕西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5450-5192-6

I. ①遣… II. ①韩… ②唐… III. ①中日关系—文
化交流—文化史—中国—唐代 IV. ①K24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5646 号

QIANTANGSHI ZAI CHANG'AN

遣唐使在长安

韩养民 唐 群 著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丈八五路 58 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中煤地西安地图制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印 张	17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0-5192-6
定 价	38.00 元

目 录

引 子 想起遣唐使	(1)
-----------------	-------

长安的国际地位	(1)
----------------------	-------

宏伟的长安城	(1)
--------------	-------

开放的长安城	(4)
--------------	-------

使节留学生云集长安	(12)
-----------------	--------

遣隋使——遣唐使的先驱	(14)
--------------------------	--------

圣德太子对中国的向往	(15)
------------------	--------

小野妹子入隋	(18)
--------------	--------

发怒的隋炀帝	(20)
--------------	--------

第三次遣隋使的双重使命	(21)
-------------------	--------

遣隋留学生与学问僧	(24)
-----------------	--------

遣唐使——一千年前的友好之船 (28)

遣唐使的派遣 (29)

人才济济的使团 (38)

落后的航海术 (43)

遣唐使渡海航线 (48)

以生命为赌注的航程 (55)

入长安——遣唐使的特殊使命 (59)

唐朝廷的盛情接待 (60)

外交使命 (63)

文化使命 (68)

贸易使命 (73)

遣唐使停派 (75)

日有贤君——遣唐使的风采 (83)

遣唐大使——吉备真备 (84)

传奇大使——藤原清河 (90)

使团中的音乐使者 (96)

使团中的围棋使者	(106)
画像中的遣唐使形象	(109)
长安寺院——学问僧拜师求法	(114)
长安寺院拜师求法	(115)
五位获大师称号的学问僧	(126)
入唐八大家的文化贡献	(147)
国子监——留学生学习唐文化的学府	(153)
留生活种种	(154)
留学三十二年始归国	(166)
虚往盈归的留学生	(169)
埋骨盛唐的留学生	(172)
神秘的留学生井真成	(175)
长安娶妻——遣唐使的跨国婚姻	(178)
唐日国际婚姻	(179)
辨正与秦朝元	(182)
羽栗吉麻吕和羽栗翼	(187)

藤原清河与喜娘	(191)
混血儿的悲剧	(195)
仿长安——遣唐使把“唐朝”搬到日本	(200)
仿唐制进行政体改革	(201)
仿唐朝制定经济措施	(204)
唐生产技术在日本推广	(206)
唐文化对日本影响深远	(212)
唐文学艺术在日本绽放	(217)
唐体育和娱乐活动在日本的发展	(225)
唐科学技术在日本的发展	(231)
日本汉方医学的形成	(239)
学问僧西来与中国佛教东传	(242)
日本民间的唐人风俗	(251)
参考文献	(258)
后 记	(260)

引子 想起遣唐使

在世界各国的关系史中，像中日两国之间这样友好往来，文化交流如此源远流长、如此频繁亲密的，恐怕是非常罕见的。仅就文字记载来说，中日两国之间的交往就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在这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中日两国之间，除了在中国的元代、明代和近代曾有过一些极短的不愉快的时期和事件外，中日友好往来的历史，相互学习与文化相互渗透的历史，总是占据主流；即使在那些短暂的不愉快的时期，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仍然脉脉相通，从未间断。

中日两国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犹如自然界的江河湖海一样，有潮涨潮落：有时为汹涌的大河，有时为涓涓细流。如果说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主要是中国向日本学习的中日交流的高潮时期，那么，在中国的隋唐时代——尤其是唐代，则主要是日本向中国学习的中日交流的高潮时期。特别是在唐代这个高

潮时期中，日本在长达二百六十四年的时间里，前后向中国派出了十九次遣唐使团（包括三次任命而未成行的遣唐使团，一次迎入唐大使，一次护送唐大使，一次只到达朝鲜半岛），它不仅巩固和发展了两国的友好睦邻关系，更重要的是日本大批优秀的留学生、学问僧等参加遣唐使团来到中国，把两国的交流推广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娱乐乃至风俗习惯等各个领域，使两国的思想文化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联系，也在两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与思想感情中播下了友好的种子。所以，唐代的中日交流高潮，对于中日两国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的整个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把自古以来中日交往的涓涓细流汇成波澜壮阔的大河，而且为以后中日两国的世代友好奠定了可靠基础。

以遣唐使为主要方式的唐代中日交往，是中日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成功的一个光辉范例。当时日本的统治集团不惜为遣唐使投入那么多的人力和物力，日本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的劳动人民不畏东海上的狂风巨浪，万里迢迢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唐帝国来学习，以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促进日本民族文化的形成和繁荣。这不但说明当时日本的统治集团具有积极进取的精神，而且说明日本人民、日本民族有着克服困难、不怕牺牲、积极学习外来先进文化的优良品质。这种学习先进、积极进取的精神，此后一直被继承和发扬光大，并成为日本民族性格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难能可贵的是，日本民族在向外国学习方面既能采取“拿来主义”，兼容并蓄，又能通过自己“健壮的胃囊”把有用的东西吸收消化，变为自己的血肉，把无用的东西作为废物排泄出去。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日本虽然采取了中国许多的文明，刑

法上却不用凌迟，宫廷中仍无太监，妇女们也终于不缠足。”（《出了象牙塔·后记》）众所周知，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在实现国家近代化方面取得了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战争的废墟上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了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这些都和日本民族学习先进、积极进取的精神分不开。而这种精神正和日本古代积极派出遣唐使，向先进的唐朝学习的精神一脉相承。所以，我们今天研究日本派出遣唐使的历史，不但有利于中日两国的世代友好，更在于提醒人们，在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进程中，虚心求教与开放包容才是各国间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应有态度。

长安的国际地位

隋唐时期，随着国家统一、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恢宏豪迈、开朗奔放、积极进取的景象。在对外关系上，来往于亚洲、非洲、欧洲国家的使节不绝于途，先后有七十多个国家和唐朝建立了关系。同时，唐王朝还对迁居中国的外国人采取优惠政策，到公元787年（唐德宗贞元三年，日本桓武天皇延历六年），迁居长安的中亚、西亚各国的侨民已达四千多户。当时长安城约有一百五六十万居民，而各国侨民约占总数的2%。长安成为一座各族人民聚居、各国侨民往来的国际性大都市。

宏伟的长安城

在一次聚会上，日本汉学家池田大作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华夏文明。池田大作即兴问道：“阁下如此倾情古老的神州大地，假如给你一次机会，你更愿意生活在中国五千年漫长历史中的哪个朝代？”汤因比略作思索后回答：“要是出现这种可能性的话，我会选择唐代。”“那么……”池田大作试探性

地说，“你首选的居住之地，必定是长安了。”

不只汤因比对唐朝如此青睐，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也曾为了一睹“唐朝的天空”，于1924年专门来到“长安”，亲身体验它的伟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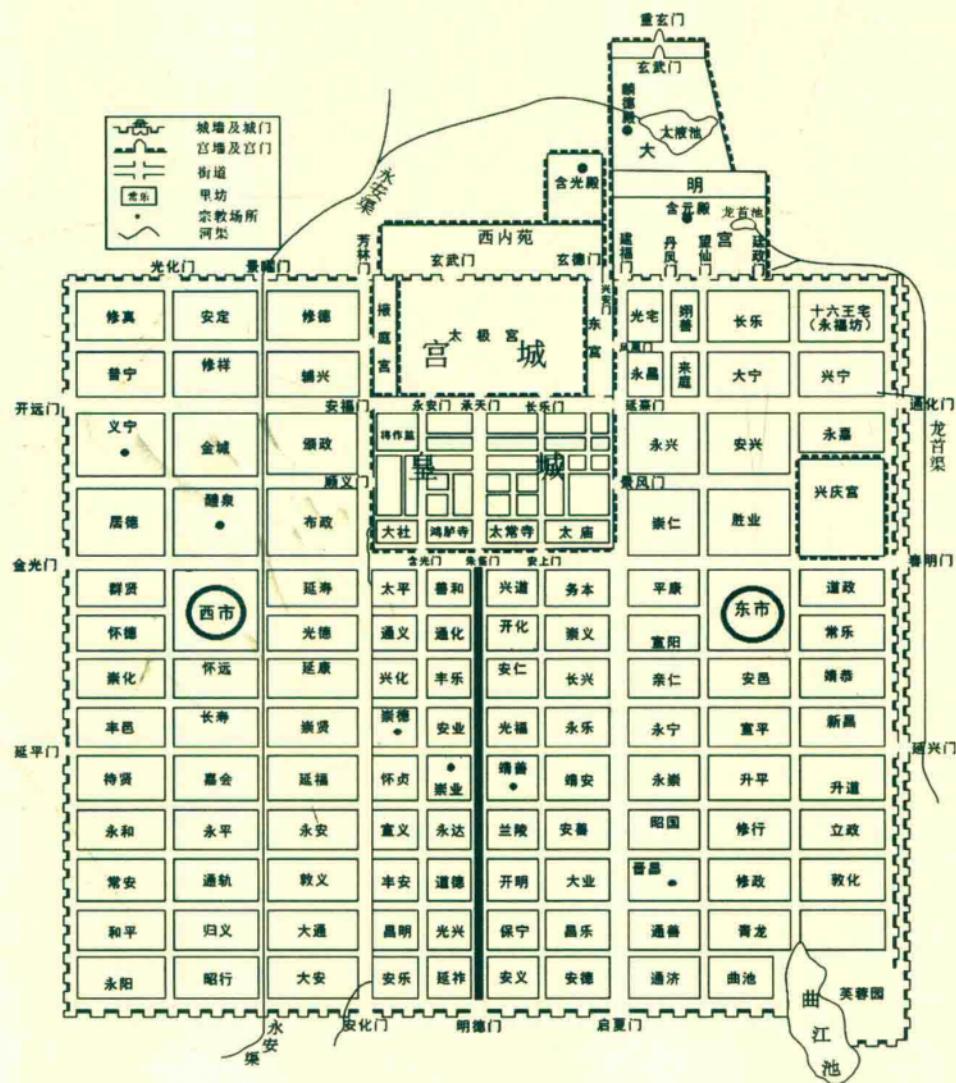
唐朝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唐太宗在位期间实行了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赢得了民族融合，迁居长安的少数民族数量十分可观。仅贞观时期迁居长安的突厥人就有一万户，而且突厥贵族被唐朝政府任命为将军、中郎将等五品以上官吏的就达百余人。当时，身着各式服装的边疆各族人民会聚长安，长安成为国内外各民族交往的中心。

唐都长安是一座国际性大都市，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唐六典》记载唐王朝曾与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互相交往，每年都有大批外国客人来到长安。唐朝政府设有专门机构（鸿胪寺、礼宾院）负责接待外宾，并设置有翻译人员，提供各种交流便利。陕西乾县章怀太子墓墓道东壁的壁画《礼宾图》，就生动地描绘了中外友好往来的场面。

长安城里的上百万人口需要大量的商品供应，全国各地的商人和外国商人云集于此，兴贩贸易，使长安东西两市的商业达到了兴隆繁盛的高潮。仅见于历史记载的，两市行业就有铁行、肉行、笔行、大衣行、鞦韆行、药行、秤行、麸行、鱼店、酒肆、绢行、帛肆、衣肆、寄附铺（寄卖所）、波斯邸（专供波斯人居住或存放货物与交易的场所）等。唐朝后期，两市繁荣达到极盛。由于长安城规模大、人口多，为适应居民的需要，两市周围和城门附近的各坊也发展起来。如北宋宋敏求在《长安志》卷第八中

记载崇仁坊：“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这说明中唐以后，长安城工商业的发展，在地区上突破了两市的范围，在时间上突破了夜禁的限制。

长安城究竟有多大？据史料记载，唐长安城面积达 84 平方千米，是汉长安城的 2.4 倍，是明清北京城的 1.4 倍，比同时期的拜占庭王国都城大 7 倍，较公元 800 年所建的巴格达城大 6.2 倍，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城之一。



唐长安城平面布局图

开放的长安城

允许入境居住

南北朝和隋朝之后，唐朝再一次经历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各民族进入唐境的主要原因有被迫内迁和寻求保护两种。当时因仰慕唐王朝经济文化生活而零散入境的人也很多。公元630年（唐贞观四年，日本舒明天皇二年），唐打败东突厥，十五万突厥人南下归附，入居长安的有近万家。公元690年（武周天授元年，日本持统天皇四年），西突厥可汗斛瑟罗率残部六七万人徙居内地，斛瑟罗后死于长安。此后，西域胡人等入境安居的人络绎不绝。

唐朝政府曾在公元737年（唐开元二十五年，日本圣武天皇天平九年）对外国人移居中国做出了专门规定：“化外人归朝者，所在州镇给衣食，具状送省奏闻，化外人于宽乡附贯安置。”另外，还可免去他们十年的赋税，这就更加吸引了外国移民，这也是粟特、新罗、大食、波斯等移民社区形成的重要因素。如登州的“新罗坊”、青州的“新罗馆”、敦煌和凉州的“昭武九姓”等。唐末黄巢之乱时，广州地区就有两万多外国人被杀，这也说明入境居住的外国人很多。

允许参政做官

唐王朝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州县，都有外国人或异族人担任官



唐牵骆驼黄釉陶俑

唐代明器，高42.4厘米。1957年在陕西省西安市唐鲜于庭诲墓出土。

职。如京畿道委任的 715 人次刺史中，异族人有 76 人次，超过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其中尚不包括早已同化者。安国人安附国一家三代在唐朝做官，康国商人康谦，高丽人高仙芝、王毛仲，日本人阿倍仲麻吕（留居中国五十年，后改汉名晁衡），龟兹人白孝德，波斯人李元谅、李素，越南人姜公辅，新罗人金允夫、金立之等都在长安任过高官。唐朝大胆地启用外族和外国人入仕为官，采取“兼容并包”的用人政策，无疑是其国际性交流眼光的表现，也可以说是中外双向互补的表现。

法律地位平等

按《唐六典》记载，盛唐时期有七十多个国家与唐王朝经常往来，外国人在唐朝居住者众多，因此，难免有违法犯罪现象。唐朝对外国侨民在中国领土上所发生的法律纠纷，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凡是外国人，同一国家侨民之间的案件，唐朝政府尊重当事人所在国家的法律制度和风俗习惯，根据他们的法律、风俗断案，享有一定的自治权；而对于来自不同国家的侨民在唐朝境内发生的案件，则按唐朝法律断案，在法律地位上与汉人完全平等，没有特别的法外治权。这种涉外立法，体现了唐朝立法的属人主义和属地主义原则，具有深远的意义。

保护通商贸易

公元 627 年（唐贞观元年，日本推古天皇三十五年），唐朝就已开放关禁：“使公私往来，道路无壅；彩宝交易，中外匪殊。”公元 630 年（唐贞观四年，日本舒明天皇二年），西域各国派遣商使入唐，唐太宗下诏“听其商贾往来，与边民交市”。此后，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使西域诸国的商旅源源不断地进入河西与长安，海上商船也络绎不绝地到达中国南部沿海城市。唐王朝对通

商贸易非常重视，不仅在中亚一带驻扎军队保护商旅安全，而且收取的商税较低。大批外国商人经由陆路和海道来长安以及洛阳、广州、泉州、扬州等地，运来香料、药材和珠宝，带走丝绸、陶瓷等物品。在长安的许多胡商以经商致富而闻名。正因为唐王朝对外商持优惠政策并加以保护，有时甚至给予特殊照顾，鼓励交易，如每年冬季都要给“蕃客”供应三个月柴薪取暖，所以胡商乐不思蜀，“安居不欲归”。

允许通婚联姻

异国或异族通婚是打破“华夷之辨”的一个重要内容。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六月敕令称：“诸蕃使人娶得汉妇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唐律令格式中也有类似规定。从出土的唐代墓志中可以看出，异族联姻非常普遍，特别是散居内地者更容易胡汉联姻。据史书记载，唐高祖十九个女儿中有七个嫁给胡族，唐太宗二十一个女婿中有八位异族驸马，唐玄宗三十个女儿中有五个嫁给胡族大臣。大臣中如裴行俭、张说、唐俭、于休烈、史孝章等人也皆是胡汉联姻。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即娶长安女子为妻。还有许多胡人与汉人通婚的事例，如武周时游击将军孙阿贵的夫人竹须摩提就是位印度女子。

文化开放互融

盛唐时期的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世界各国文化在长安城中交汇，形成了史无前例的创造性风貌。阿拉伯商人苏烈曼于公元851年（唐宣宗大中五年）到中国广州一带经商后，西归写成《苏烈曼游记》，称颂中国平等对待外来的穆斯林。他在书中写道：“各地回教商贾既多聚广府，中国皇帝因